

国家荣誉的治理逻辑*

——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研究的缘起、样态与展望

杨 岩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是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必然要求,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环节,是凝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力的有力举措。2007年以来,国内学者关于功勋荣誉表彰的研究开始萌芽,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断增多,进行了多维度的学理审视和探索性表达。经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发现,国内学者基于不同学科展开了学术层面的理性思考,具有自身的逻辑性与适恰性,主要形成了以下三种基本的研究样态:一是制度层面的规范考察,涉及功勋荣誉表彰制度的历史演进、现实审思与国际观照;二是价值层面的内核阐发,探讨了功勋荣誉表彰的内涵特质与功能作用;三是效能层面的路径优化,融通理论构建与实践探索的双向赋能,探析了功勋荣誉表彰的推进策略与完善建议。然而,总体而言,这一主题研究仍处于积累阶段,视角相对单一,大多集中于制度建设的描述及其必要性的论证,缺乏系统性的理论阐释,对其内在运作机制与实践效能的考究亦显不足。为此,未来研究应在研究论域、内容与方法上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着力构建荣誉治理的整体性逻辑框架,深刻探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的发展图景,深入剖析功勋荣誉表彰活动的仪式传播,深度解码功勋模范人物的群像符号叙事,以期更充分地揭示其价值内核与治理效能。

[关键词]国家荣誉制度 功勋荣誉表彰 荣誉治理 象征 认同

[中图分类号] D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983X(2026)05-0112-13

中国自古有荣誉表彰传统,以礼正国,以励率民,最直接地展现了荣誉的道德价值与治理取向。在新时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功勋荣誉表彰被赋予新内涵新要求,已然成为持续汇聚强大精神力量的重要构成。更进一步说,功勋荣誉表彰作为一种象征意义体系,其本身所具有的符号隐喻与意指实践,生动映射出个体与共同体的意向性关联,传递了深层的民族文化记忆和核心价值观,表征了公众情感归属和集体诉求,并

从国家意志层面更为宏大地促成人民主权叙事下认同秩序的生成,俨然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因此,基于国家治理的视角,需要加强对功勋荣誉表彰基础性议题的归纳总结,从中窥探既有研究的知识图谱和热点趋势,进而展望未来的拓展方向与深化路径。

一、功勋荣誉表彰研究的缘起

在现代化语境中,国家治理是国家能力的

收稿日期:2025-08-25;修回日期:2026-07-14

*基金项目: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象征与认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的育人机制研究”(KYCX22_0032)

作者简介:杨岩,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

体现,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功勋荣誉表彰属于政策激励的范畴,既深植于历史叙事,又紧扣现实情境,是在国家建设意义上的一种柔性化治理方式。

(一)问题的提出

功勋荣誉表彰是国家荣典礼仪的重要发展,是治国安邦之大计,在意识形态建设与社会整合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理应继续发挥好其现实功能。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功勋荣誉表彰工作,以一系列开创性、前瞻性的重大举措,构建起中国特色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发挥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的精神引领、典型示范作用,推动全社会见贤思齐、崇尚英雄、争做先锋。^[145]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共和国勋章”“七一勋章”“八一勋章”“友谊勋章”及国家荣誉称号评选颁授工作的深入推进,我国功勋荣誉表彰制度已全面落地。同时,坚持集中宣传与日常宣传相协调,对功勋模范人物进行常态化长效化的表彰和报道,更是展现了中国特色大国情怀、大国精神和大国力量。从制度设计到颁授实践,再到英模引领,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日益丰富完备,充分彰显了新时代荣誉治理的制度创新力、价值引领力和实践凝聚力。

具体而言,制度是构筑荣誉体系的刚性基础,是引导释放治理效能的坚强保证。以法律的形式确立荣誉的激励导向,无疑赋予了功勋荣誉表彰本身更多的政治含义,使之更具权威性、稳定性和公信力。相应地,在规范表彰奖励活动中不断总结新的经验,又进一步推动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从深层次上说,以具身化的颁授仪式为载体,凭借强有力的情境展布、身体操演与技术塑形,聚合个体切身感受和鲜活体验,强化主体间互动的情感联结,促使“同一性”的集体身份得到确认和强化。特别是功勋模范人物的荣誉延续,呈现出生动有形的符号性和标识性,有力达成英雄文化的象

征意指以及“鲜活的价值观”的形象输出,从政治心理上进一步巩固“正向激励”,更易为社会成员所接受、吸收和内化,于无形中发挥出镜像化“典型群体”,抑或“理想类型”的隐性教育力量。鉴于此,立足于新时代视域,国内学界考察功勋荣誉表彰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政治现象,应合乎历史逻辑,契合政策导向,符合现实需要。而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钩沉、考辨和反思,有助于厘清功勋荣誉表彰研究的基本范围与建构方略,从中更好地把握研究重点和新的学术生长点。

(二)文献回顾

从学术史来看,国内学者关于功勋荣誉表彰的研究,主要发轫于2007年,这与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设立国家荣誉制度,表彰有杰出贡献的文化工作者”有关,自此,这一主题逐渐受到国内学者关注。特别是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提出“建立国家荣誉制度”,将其表彰范围从文化领域扩展到各类突出贡献人才,进一步提供了鲜明的政策文本导向与明确的战略方向,并且随着相关指导意见、法律法规与条例办法的日益规范,研究数量渐进增加较为明显,恰恰是这一创制性实践应运而生的现实确证。国内学者注重纪实性叙事与比较分析,主要围绕以下三个热点论域展开,即制度层面的规范考察、价值层面的内核阐发与效能层面的路径优化,集中搭建起功勋荣誉表彰研究的基本框架。

一是以思想史为导向,考察功勋荣誉表彰的规制发展,描述其演进脉络、存在问题与国际模式比较,呼应历史语境与权力现实,构成国家荣誉治理的“硬框架”,从中揭示了荣誉制度与国家任务、治理需要之间的紧密联系;二是以大观念为基础,解析功勋荣誉表彰的价值向度,阐释其内涵特质与功能作用,契合公众“期待视野”,构成国家荣誉治理的“软内核”,从中挖掘了荣誉所承载的多重治理意涵;三是以现实感为依托,探讨功勋荣誉表彰的优化设计,提出理论构建与实践探索的双重可能性路径,融通最新制度成果和榜样典范,构成国家

荣誉治理的“活机制”，从中探寻了何以促成荣誉制度与价值理念的落地生根。这三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共同推动功勋荣誉表彰制度实践的不断完善和发展。整体而言，以现有成果为思考前提，有其历史必然性与现实必要性，这是研究功勋荣誉表彰的学术基础，亦为功勋荣誉表彰治理实践予以理论支撑。加之，整合以荣誉为基点的典型论域，助力审视荣誉治理的研究概况与动态进展，以期功勋荣誉表彰相关探讨提供材料积累与重要参考。

概括地说，有关功勋荣誉表彰的研究，有其具体发生发展的“现实的历史”语境，呈现出明显的时间轴和空间域，隐含国家治理的价值逻辑，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荣誉话语体系的知识建构。所以，在既有成果基础上，有必要回溯基本的研究样态，厘清功勋荣誉表彰的现实论题，明确与之关联的核心主题，从中归纳已有研究的总体特征，并据此展开深入的思考探究。

二、制度建构：功勋荣誉表彰的规范考察

对于任何一种政治形态来说，无疑包含两大成分：一个是制度成分，另一个是价值成分。^{[2][22]}回到事实本身，功勋荣誉表彰制度是“作为价值”的规范化建构，在治国理政中起到了重要激励和推动作用，因此有必要进行单独、专门的梳理性研究。此类研究置于社会变迁的宏观视角之下，主要集中于功勋荣誉表彰制度的历史演进、现实审思与国际观照三个方面，这是国家荣誉治理的“硬框架”。

（一）功勋荣誉表彰制度的历史演进

追溯到源点，荣誉最早由军功赏赐发展而来，与身份、正义与秩序紧密相关。功勋荣誉表彰制度是政治伦理的直观外显，服务于国家任务和治理需要。

一是以新中国史为关键点。我国荣典表奖传统由来已久，影响深远。有学者梳理了中国历代勋爵荣誉制度的发展脉络^[3]，即从上古时

期爵位、赐姓、旌表到清末民国勋章，分析了这一复杂性变革与培塑过程，并揭示其中所内含的“价值秩序”与“制度转型”。特别是晚清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国家荣誉立法演进，包括晚清政府勋章立法、中华民国勋章立法和中共政权早期功勋英模表彰条例，极大表征出中国社会近代化转型的历史进程。^[4]新中国成立以来，功勋荣誉表彰制度逐渐进入规范发展轨道，经历了初步形成（1949—1956）、曲折发展（1957—1977）、恢复发展（1978—2002）、趋向规范化发展（2003—2012）和实现规范发展（2012—2021）等阶段^{[5][42]}，这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阶段划分说。除此之外，还有侧重于某一领域荣誉制度的具体性探讨，主要有军队荣誉、劳模荣誉、体育荣誉、科技荣誉和共青团荣誉等，这些研究内嵌荣誉治理的现实关怀，直观反映出不同时代的制度建构与社会风貌。

二是以党史为切入点。党中央历来尊崇英雄，注重荣誉的引领、感召和规约，并将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不断引向深入。在这类研究中，学者们聚焦于建党以来功勋荣誉表彰制度的整体性沿革，抑或某一历史阶段的探索提升，昭示着不同时期政治文化建设。李华系统探赜了功勋荣誉表彰制度的发展脉络，有民主革命时期的初步实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推进与曲折发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恢复与规范化运行、党的十八大以来制度化与创新发展，并就其基本经验提出了若干思考。^[6]孙云着重探究了中共英模表彰制度的历史生成与时代特征，指出初现雏形于中华苏维埃时期，蓬勃发展于延安时期，正式确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随后经历了困难时期、“文革”时期、后“文革”时期、改革开放至今的嬗变发展。^[7]除总体性研究外，也有学者对特定时期的勋章设立、表彰制度作出重点分析，如中央苏区功勋荣誉表彰研究。不难看出，我们党始终重视功勋荣誉表彰制度的治理效能，不断进行探索式的规制与建构，切实保证荣誉体系的话语共识，旨在促成

国家倡导目标的实现。

(二) 功勋荣誉表彰制度的现实审思

任何一种制度的创立,必有其外在需要,也有其内在用意。^{[8]5}就我国来说,国内学界普遍认为,在进入新时代之前,功勋荣誉表彰在政策统领、制度安排与贯彻执行等方面存在治理局限,并对此进行理性思考和评介建构。

一是缺乏统筹规划,表彰体系不尽合理。研究显示,我国勋章奖章和荣誉称号体系不统一、不完备,缺少顶层设计与科学规划,导致荣誉目标与功能定位不清晰,进而削弱了国家荣誉应有的严肃性和内在道德力。其中,评比、奖励和管理面临着“过杂、过多、过乱、过滥”^[9]等泛化现象,存在多头管理、标准不一、碎片化严重和权威性不足等问题。此外,表彰对象、类别名称、授予程序较为模糊,奖励评价标准不够明确,配套待遇尚不全面,后续监督和评价机制激励性有待加强。以上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荣誉的引导价值与实际效力。

二是缺乏创新导向,法制规范不够到位。既有研究表明,最高层级荣誉制度体系的缺位,使授勋及奖励形式在实践中缺少明确的法律依据,因而带来层级不分明、衔接不紧密、管理不持续等一系列权限位阶挑战。归根到底,是严格意义上荣誉立法的针对性不强,尚未形成系统兼容的制度框架和清晰的法律指引。因此,以钱宁峰^[10]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弥补这一问题的基本路径是创新荣誉制度立法,增强荣誉实践的法理效能。更进一步说,以专门法律的出台调适,实现荣誉评选、授予和管理的边界弥合,正是规避荣誉颁发不确定性和荣誉贬值的有效途径。

三是缺乏有力宣传,影响范围不甚广泛。有研究指出,对勋章制度的宣传解读不够,宣传方式简单、宣传内容同质化、媒介融合度不强,使之成为一种有限的“单向度”传播。这样,直接引发了社会知晓度偏低、参与实践程度不够、功能性认知固化、认可度不强和示范

效应较弱等^[11]价值虚置问题,特别是在阐释其内涵及重大意义方面,产生了荣誉效果不佳、吸引力弱化、共鸣幽微等现实梗阻。此外,还有针对内在的归因追问研究,强调荣誉实践中结构要素的缺陷、运作过程的多元限制以及评选结果的动态性和不确定性等因素^[12]也不容忽视,而这些对于解决“影响面小”的制度盲区、突破宣传造势的技术困境具有重要启示。

(三) 功勋荣誉表彰制度的国际观照

在不同政体的国家中,荣誉性质的奖励广泛存在。^{[13]5}作为国家治理的一种制度性安排,功勋荣誉体系受到全世界高度关注。部分学者选择横向比较,概述了各国荣誉制度的基本意向,总结不同荣誉文化表达策略,从中探寻实现荣誉现代化的域外借鉴。

一是内容概况分析。环顾世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已建立统一的功勋荣誉表彰制度,涉及军事和民事两大领域,甚至有些国家的勋章、奖章具有显著的国际影响力。以张树华为代表的学者,对比考究了中外功勋荣誉表彰制度的历史沿革、主要内容、基本特点、授予情况及相关法律建设。^{[13]1-4}另有研究专门对某一国家荣誉制度进行深刻剖析,从侧面展现了不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的价值面向,具体研究对象包括俄罗斯^[14]、美国^[15]、韩国^[16]、日本^[17]、澳大利亚^[18]、英国^[19]、意大利^[20]、法国^[19]和德国^[19]等。此外,也有研究者对这些国家某一具体领域的荣誉制度做了深入探讨,如军事^[21]、教育^[22]和消防^[23]等。

二是案例对比研究。从国际经验来看,功勋荣誉表彰制度覆盖面广,囊括不同领域,严格规定内容,使得荣誉实践有了规范和指引。有研究选取科技、文化、政务和社会领域的荣誉类别,分别就科技领域的中美、文化领域的中法、政务领域的中美以及社会领域的中英典型个案进行论述,在基本内容、特点成效和发展趋势的对比研究中,提出了国家荣誉制度立法研究与建设思路。^{[24]117-118}陈高朋则比较分析了中国和英美法韩德俄等国当代体育荣誉制

度的实践差异^{[25]198}，并对新时代体育荣誉观的培育与实践机制进行考究。

三是借鉴意义阐述。以开放性视野镜鉴国外荣誉制度，既有助于总结现行荣誉体系，也能引介其特色经验和先进做法，为我国建立“统一的、国家级的、具有广泛社会认可和国际影响”^[19]的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予以启发性洞见。主要有以下观点：一是注重历史与政治传承，满足现实需要，促进民族国家发展；二是强调制度保障，以法律法规的形式明确荣誉内容与功能规范；三是重视精神奖励，宣传报道力度大，引导统一价值观形成与巩固。可见，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正确处理功勋荣誉表彰制度的本土化和国际化关系，并在具体实践中不断积累有效经验，有助于荣誉性激励作用的充分释放，展现国家荣誉治理的新时代风采。

从现代意义上而言，功勋荣誉表彰制度是一种以爱国主义为内核、体现政权合法性和集体认同的“荣誉政治”，深刻影响着共同体治理秩序和活力。根据现有的学术成果，对功勋荣誉表彰进行规制思考，不仅体现了以符号为表征的政治技艺和国家治理智慧，更映射出制度建构视域下人的主体性价值的彰显。

三、价值涵育：功勋荣誉表彰的内核阐发

功勋荣誉表彰是对个人贡献与价值的肯定，折射出共同体意识的客观实在性，更是实现“价值权威性分配”和推进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现有文献中，不少学者从功勋荣誉表彰的“精神属性”上展开解释性研究，这是国家荣誉治理的“软内核”。即是说，在价值层面何以将个体荣誉感与国家尊严相联结，充分发挥其引领、示范、规范和激励等功能。

（一）功勋荣誉表彰的内涵特质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26]178}在我国，功勋荣誉表彰是国家精神的承载，凸显荣誉与责任的内在互动，彰

示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内涵深刻、特质鲜明。与之有关的学术成果，集中探究功勋荣誉表彰的内容特质。

其一，关于“荣誉”“国家荣誉”的概念内涵厘定。功勋荣誉表彰最早源于荣誉，所以，在研究这一概念之前，有必要对“荣誉”加以明晰。关于“荣誉”的界说，虽尚未形成完全统一的理论界定，但普遍承认其与个体生命价值及共同体的贡献密切相关。从伦理学和法学维度看，荣誉被理解为一种社会道德现象，包含对个体道德行为之社会价值的客观评价与主观意向的统一，其标准更多地植根于集体义务感和社会伦理责任。从政治学和管理学维度看，荣誉被诠释为一种具有正向激励、组织管理作用的差序治理技术与政治评价模式，内嵌特定统治阶级的权力意识，关乎共同事业的价值宣示。尽管研究者对功勋荣誉表彰内涵的探讨较少，却较多分析与之相关的“国家荣誉”。有学者从广义上对国家层面的荣誉表彰进行了释义，即对为国家、社会发展具有杰出贡献的人才进行表彰的荣誉^[27]，并以颁授荣誉称号、勋章、奖章等形式予以奖励。韩志明、史瑞杰认为国家荣誉是社会建构的结果，是以国家的名义对具有优良品行、作出巨大贡献或取得杰出成就的个人或集体所给予的表彰。^[11]张年认为功勋荣誉表彰是对个人和集体所表现的道德品质或对国家和社会具有突出贡献的褒奖活动。^{[5]42}概括说来，所谓功勋荣誉表彰，是党和国家为实现特定政治目标和治理任务，依照法定的条件与程序，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作出卓越贡献的功勋模范人物所进行的一种奖励安排。

其二，关于“荣誉”“国家荣誉”的原则特质探析。在良好的政治体，荣誉有其自身的价值序列，以个体的自主能动性和内在自尊为内核，表现出个人与公共双重价值规定性。鉴于荣誉的无上光荣，亦体现其稀缺性。因为公共荣誉“只有不平等地加以分配”“才能使我们受到鼓舞”^{[28]9}，这正是其内在价值所在。为了适应现实需要，学界日益倾向于推动功勋荣

誉表彰走向规制运行。就表彰奖励的原则而言,学界观点不一。有学者强调遵循“依法奖励、实事求是、奖励与受奖行为相一致”^[29]原则论;亦有学者主张“权威性与代表性、继承性与创新性、本土性与开放性”^[30]相结合原则论。关于功勋荣誉表彰的特点,不少研究者富有远见地表明了观点。张树旺认为作为一种长效性的精神奖励,国家功勋荣誉具有向外的示范效应和向内的心理崇高性。^[31]国晓光认为国家荣誉具有多重特性:义务感是国家荣誉的重要动因,认可的相互性是国家荣誉的表现形式,尊严与归属感是国家荣誉的内在品性,权威性是国家荣誉的显著特征。^[32]还有学者从制度层面切入,归纳出诸如政治性、权威性、规范性、引导性等多维特征。^[33]尽管上述归纳在具体表述上有所分野,但均指向一个共识:功勋荣誉表彰服膺于统治阶级需要,并呈现为历史继承性、时代发展性、政治象征性、社会建构性和道德教育性等多重原则特质。

(二) 功勋荣誉表彰的功能作用

功勋荣誉表彰以个体的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肯定为原点,生成多重价值向度,是涵育人们坚定前行的强大精神动力。故而,研究者指出应深入阐释功勋荣誉表彰蕴含的治理意涵,明晰其功能定位,努力实现国家意志、规范社会行为及个体自身发展的价值。^[34]

其一,意识形态建构功能。学者们认为功勋荣誉表彰是“政治正当性、稳定性和正统性的象征”^[9],这一表彰行为凝结了集体主义精神和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激发了意识形态引领和统合功能,在塑造政治认同、展示政党形象与引领政治发展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历史事实证明,根据不同时期的目标任务,荣誉表彰所传导的核心精神,始终体现并作用于意识形态的价值建构。早在土地革命时期,我们党就高度重视荣誉表彰工作,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塑造的鲜活的劳模形象和“国家意识形态不断发生胶合与同构”^[35],且与人民意愿互动同行,进而最大限度地促进党的思想政治

工作的有效开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其获得者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覆盖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实质上,其背后印刻了以国家权力介入荣誉价值实现的治理逻辑,正是现代国家治理中的“表彰政治”,具体表现为促进“国家政权建设、政治体系日常运行、合法性基础建构、政治秩序的巩固等”^[36]^[20],从而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实保障。

其二,社会文化引导功能。根据已有研究,功勋荣誉表彰是政治社会化的重要方式,其价值在于宣传动员和日常养成,促成扬善目标和群体示范效应。一方面,传承丰富了党的精神谱系,推出可知可感可供效仿的功勋人物,借由系列报道与情感叙事,在社会文化中更具凝聚力、感染力和说服力;另一方面,树立社会生活的最高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形成“标杆效应”,是倡导和引领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和社会风尚^[37]的关键环节。沿此思路可知,这是政治文化的有力延伸,也是国家治理的有效补充,在与其塑造的先进典型共同推动下,起到引路和内聚作用,成为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的强大精神武器。既有研究表明,党内表彰工作中先进典型的选树和运用,在引导、带动与教育群众方面成效显著,而颁授仪式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则更为突出。正如托尔维克所说,“荣誉,在它最受人们重视的时候,比信仰还能支配人们的意志”。^[38]^[77]为此,注重荣誉产生的社会文化意义和引领价值,更有利于彰显公平正义、增强使命意识和凝聚奋斗力量。

其三,个体发展激励功能。马克思指出,“尊严就是最能使人高尚起来”“受到众人钦佩并高出于众人之上的东西”。^[39]^[45]荣誉与“人的尊严”直接相关,体现对人的价值意义的关注,兼具引导个体行为和形塑集体认同的双重功能。在现实生活中,这一人才表彰奖励价值功效鲜明,成为凝聚人才、推动实际工作的重要抓手。对大学生来说更是如此,要发挥其个体性、社会性和超越性德育功能^[40]^[25],促

进精神富裕。就已有成果而言,大致有两类思路。第一,对于英模典型而言,荣誉激励突出“实现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能动意识,满足个人发展的高层次自我实现需要,有力肯定并强化其正确的职业劳动价值观,进一步提振干事创业的热情和潜能。第二,对于受众个体而言,这是一种“非权力的影响”,提供了“一种真正的自由主义形式的教育”^{[28]13},嵌入了“榜样教育”的内生动力与激励导向,在崇高荣誉与具体鲜活的生命主体感召下,产生敬佩、自豪和亲切感,并表现出自觉效仿的行为意向。更重要的是,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人才体制机制革新,为国家和社会更好地培养“国之大者”型人才,深刻印证了尊重劳动创造与践行创新发展新理念的价值逻辑,因而要切实发挥好这一层面的治理功能。

基于以上论述,功勋荣誉表彰受到国家发展逻辑和荣誉自身逻辑的双重影响,在肯定个体“德性的价值”的同时,将这种“内在性”自觉融入共同体秩序,不失为一种现代化治理的“软力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对功勋荣誉表彰在政治、社会与个人层面的内核阐发,是应对荣誉实践问题行之有效的助力器。

四、效能提升:功勋荣誉表彰的路径优化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既有成果从荣誉建构逻辑展开了探索性研究,不少学者回应了新时代之前国家荣誉面临的制度困境,又进一步阐述了功勋荣誉表彰与其他因素的内在关联,并提出一系列制度优化与效能提升策略。这些研究遵循“理论—实践”双轨并进路径,给出了有关国家荣誉治理“活机制”的多重思考,有力凸显了荣誉的社会行动范式。

(一)理论构建:基于象征、仪式与认同的诠释路径

在国家荣誉的制度框架下,国内学者从多层次探求推进功勋荣誉表彰的规律性认识和

功能机制。相关研究注重理论赋能,主要聚焦象征、仪式和认同三个理论维度,形成了具有阐释力的致思路径。

第一,以象征之维为切入点。作为国家治理的隐喻系统,功勋荣誉表彰兼具象征性与仪式化,主动塑造公众价值视界,所以,拓展国家荣誉仪式中他者形象的延展性不容小觑。王海洲从象征维度出发,创新性地诠释了国家象征能力在现代国家治理中的四种功能,提出其建设路径在于强化由国家主导的“赋能”,通过国家制度和政治精英中的象征嵌入,自上而下地提升其荣誉效能。^[41]这种象征的有效嵌入,适应了这一隐喻式表彰行为的传播意指,也为理解功勋荣誉表彰的运行机制与政治效能提供了新视角。薛洁认为国家荣誉体系是国家建设的象征领域,以法律与制度的形式予以规范,顺应社会发展对意义象征系统的需要,其中,勋章设计、制度立法、颁授仪式等方面均体现了人民意志。^[42]

第二,以仪式之维为结合点。国内研究者指出,功勋荣誉表彰活动本身存在强大的仪式场,通过“筹策、展布、操演、刻写”等仪式运作环节以实现特定功能呈示。^[43]相关研究大多围绕颁授仪式、荣誉勋章和功勋英模等核心仪式要素展开,重点考察其中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及其提升策略,并以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八一勋章”颁授实践为典型分析对象。^{[44]55}回顾党的奋斗历程,表彰仪式是动员与组织群众的有效工作方法。有学者研究了延安时期劳模荣誉表彰仪式^[45],分析其历史作用以及对当前表彰仪式的有益启示。张郑武文从仪式传播角度着重剖析了功勋荣誉表彰,重构仪式本体与媒体呈现的价值图景,继而从中探寻传播意义和提升路径。^{[46]64}是故,在政治生活中,要观照媒体建构荣誉实践的治理逻辑,明确授勋仪式的纵深存续和“社会感染”效应,使之与国家发展策略深度嵌合,全面彰显新时代特色。

第三,以认同之维为落脚点。功勋荣誉表

彰隐含了一种朴素的政治哲学意蕴,充实着个人叙事与国家叙事的“在场性”,其功能特性与国家认同存在天然契合性。所以,把握好认同逻辑,是形成正确荣誉观的目标要求,也是纠正荣誉表彰乱象问题的题中之义。部分研究关注荣誉的功能性价值,强调国家认同是国家荣誉的基础^[47],主张加大表彰力度,强化话语共识,借助“符号性”表意实践唤起实然层面的主体性荣誉追求。国晓光立足于认同维度,强调国家荣誉表彰通过融合颁授仪式、唤醒集体记忆、包容公民身份、植根法律规范、融入制度体系等路径,以强化公民国家认同。^[32]

(二) 实践探索: 聚焦价值内化与制度运行的治理策略

制度使行动成为可能,为行动提供信息,赋予行动意义和合法性,并且制约知识和行动被建构的方式。^[48]^[51]考诸功勋荣誉表彰,要紧扣当下时代背景、政治制度和任务使命,以温和的治理技术嵌入,实现国家荣誉体系的本土化叙事,并在实践探索和经验总结中不断识别与弥补制度层面的不足,从而切实提升表彰实效。目前,国内学者针对该治理技艺的实践策略,主要从以下四个维度展开研究。

第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代表性观点认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功勋荣誉表彰,有其深刻的理论逻辑、现实逻辑与历史逻辑。有研究从核心价值观与国家荣誉制度的“互哺”机制出发,提出将其融入荣誉法律立、改、废全过程,规范颁授程序,构筑总分结合的荣誉法律体系,健全荣誉侵权的救济制度。^[49]还有研究主张将核心价值观的根本价值导向、基本价值理念、核心建构原则和良好引领氛围^[50]自觉融入功勋荣誉表彰实践,以实现二者的整体协同推进。此外,鉴于功勋荣誉表彰制度富含丰富的育人资源,有必要深刻领悟其科学内涵和价值理路,将其合理嵌入青年价值培育全过程^[51],在课域“主育”、史域“同育”、跨域“联育”与全域“共育”中巩固和拓展其制度效能。从制度法理层面细化价值观投

射,不断创新功勋荣誉表彰效能提升路径。

第二,以爱国主义教育为动力。当前,有学者注重探讨功勋荣誉表彰的制度教育经验。姚晓娜从爱国主义教育视角,提出制度化的国家荣誉应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念、弘扬中国精神、发挥先进典型在爱国主义教育中的引领示范作用、以“爱国”价值观入法入规等。^[52]张晓交主张通过爱国主义教育持续优化国家荣誉制度增强其系统化、参与性、在场化和形象化,使之趋向系统化和科学化。^[53]^[75]蔡中华进一步提出功勋荣誉表彰制度是推进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载体,通过发挥典型示范、善用仪式礼仪、铸牢制度根基等路径,能够增强爱国主义教育效果^[54]。概而言之,现有研究主张运用互联网平台积极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并与功勋荣誉表彰相融通,有力诠释荣誉制度长效育人的道义意蕴。

第三,以融入学校教育为重点。有学者认为,应将功勋荣誉表彰制度内容融入大中小学一体化育人机制之中^[55],一方面,将荣誉获得者的突出功绩和精神风范进教材、进案例和进头脑,在不同学科与课程教学中讲好英模故事;另一方面,深入开展学习英模活动,如英模报告、演讲比赛和社团活动等,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还有学者倡导将荣誉表彰的相关内容融入高校课程思政建设,通过锻造主力军以提高专业课教师胜任力、筑牢主战场以加强课程建设质量、用好主渠道以优化完善课堂教学内容。^[56]简言之,此类研究以融入学校教育为依托,拓展了荣誉制度的优化路向,是现代化荣誉治理的有力之举。

第四,以制度法理完善为支撑。多数学者认为功勋荣誉表彰制度建设是一项长期性的系统工程,着重探讨其法律途径与经验分析。有学者认为在实施过程中,要坚持制度预期与制度实效、制度定型与制度发展、制度刚性与制度包容性相协调,^[57]总结重大表彰活动历史规律,注重优化宣传方式、融入日常教育、强化法治保障、完善保障机制^[58]。尤其是“细化

完善勋章奖章和功勋簿管理办法、落实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者待遇保障、明确所获奖励撤销程序及条件等”^[59]配套法规,推动实现功勋荣誉表彰制度治理效能跃升。此外,部分学者较为关注国家荣誉制度的宪法整合逻辑,^[60]强调提升群众参与度,对于敦促功勋与荣誉称号的授受具有现实合理性。李涛认为功勋荣誉表彰权力、条件、程序和效力均需法律规定和保障,应加强国家荣誉制度与相关法律法规的衔接,构建定期评估机制,厘清宪法所确立的国家荣誉制度重要原则,使之科学化、规范化、体系化^[61],在此基础上,创设和丰富宪法未规定的相关国家荣誉制度具体内容^[62]。

客观而言,“理论建构”+“实践探索”,二者在相互依存的意义上进一步推向前进,共同优化了功勋荣誉表彰的研究路径,也为应对国家荣誉治理问题给出了有效方案。因此,基于合法性视域下,要坚持本土化与现代化并重,不仅是荣誉运作的关键场域,更有助于促成基于价值承认的荣誉共同体,推动实现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的创新性发展。

五、功勋荣誉表彰研究的评述与展望

功勋荣誉表彰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对其具体性研究必然会更加全面深入,甚至发展成为新的热点领域。因此,应当秉持能动的唯物史观,融汇历史的纵深与时代的关切,对功勋荣誉表彰研究进行深入评述与前瞻性思索。

(一) 以系统思维驱动功勋荣誉表彰研究论域的多维拓展

以往国内学术界关于功勋荣誉表彰的探讨,起步相对较晚,论域较为单一,而与此直接相关的国家荣誉研究比较丰富,为深化和推进这一主题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梳理这些成

果,可以发现,既有研究宏观和中观层面论述较多,微观层面剖析较少,大多基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三个维度,阐述功勋荣誉表彰的制度演进与治理效用。其中,主要侧重于纵向制度主义的研究论域,鲜有涉足荣誉再生产的整体思考,也鲜少关切活动事件的主体面向,尚未见到一种以过程为导向的功勋荣誉表彰研究体系,所以,仍有可拓展的学术空间。从发生学视角看,回归荣誉本质,制度—活动—人物共同构成了功勋荣誉表彰的完整逻辑链条,但现有研究对这一系统性分析路径的关注不够,缺乏由表及里、逐层深入的学理性阐释。为了弥补这方面不足,有必要从多元视角横向展开功勋荣誉表彰应用研究,坚持“总体性”与“细节性”相结合的研究格局,深刻关切其体系构建与效能释放,丰富拓宽相关论题的研究地图,进而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更为宽阔的认知域。

相较于过往类似的研究,首先,要致力于复合型的基础性议题研究,综合考量荣誉与之相关的多重理论范畴,弥合荣誉再生产问题域与逻辑演绎论析的不足,也为当下功勋荣誉表彰知识体系建构提供学理支持。综合运用象征、认同、仪式、情感和符号等理论工具,努力跳出单一理论资源单薄论证的叙事方式,重构荣誉运作的研究论域,阐明荣誉价值实现的逻辑理路与传播激励效果。其次,基于概念史视野,加强以荣誉为核心的基本概念研究,辨析与之相近的亲缘概念,如自尊、德性和承认等,以夯实功勋荣誉表彰相关概念的认知图式。在这一分析过程中,要坚持内部与外部、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研究思路,深度追溯功勋荣誉表彰的概念源起与中西比较,深刻揭示功勋荣誉表彰的政治文化面相与实践指向。例如,立足于“荣誉”这一经典论点,从结构—功能的视角出发,紧密围绕功勋荣誉表彰“界定—筹划—评选—颁授—传播—记忆—传承”的线索展开,有机嵌入“是什么”“为什么”“如何做”的研究理路,解构其关系逻辑,剖析其引导机

制,论证其价值生成,以扩大功勋荣誉表彰的研究视野。可见,在既有研究基础上,离不开关联性研究,从不同视域进一步回答好功勋荣誉表彰的结构要素和功能效用,对于在坚持主流意识形态下开展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二)以理论自觉引领功勋荣誉表彰研究内容的纵深探索

当前,关于功勋荣誉表彰的研究,呈现出分散化、零碎化的研究特征,有深度的理论建构与内容阐述仍显模糊,值得进一步考量和讨论。现有论题大多聚焦于制度嬗变发展、时代价值探析与实践路径优化等某一侧面,且阐释过程大多是必要性描述和价值寄予,而对功勋荣誉表彰体系的内在发生机理以及公众情感反馈表征的深入考究略显不足。所以,以理论自觉引领逻辑谱系层面的内容供给,既是理解功勋荣誉表彰的核心要件,也关乎准确把握其公共面向和价值引领效应,从而有效回应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这意味着,需要从“荣誉”这一关键表征切入,全景式概括其总体现状和内容实质,最大的创新便是集中于某一个点,以问题意识引领荣誉方向,突破以往囿于制度史研究的局限,对功勋荣誉表彰的实施效果进行现实考察,推动研究内容向纵深拓展。也就是说,除制度规范的推进式阐释之外,还应分析荣誉仪式场“榜样力量”的视觉呈现与媒介建构,切实探究荣誉共同体对人的价值形塑力的证成。

经过思考总结,一方面,要阐释人们在观念层面上是如何将象征、认同与“荣誉”联系起来的,特别是借由仪式、传播与记忆等路径,从具体人或事出发,细微展现荣誉治理的过程图景,有力深描符号与意义何以交织融合,也就是何以提供“认同空间”以及建构“认同身份”。同时,还应当看到国家、社会与个人之间的良性互动,以典型个体与群体案例为支撑,厘清荣誉实践的演进逻辑和目标导向,深化对功勋荣誉表彰价值内核的认识,不断挖掘其制度优势

和示范效应,从而为推动功勋荣誉表彰实践方案的科学制定提供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应立足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基因与实践特色,紧扣荣誉自身的运作逻辑,以全新的思路和方法,在荣誉再生产的框架内持续融入国家治理视角,加强对功勋模范人物群像的符号学分析,加大对先进人物事迹文本和精神内涵的解读力度,推进群体结构研究,解码其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象征的叙事延续,从而丰富和拓展英雄文化的相关研究。综上,应努力建构一种宏观叙述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荣誉理论框架,挖掘功勋荣誉表彰背后的价值意蕴,并与当下新时代议题相契合,同时嵌入日常生活叙事话语。

(三)以交叉视角融合功勋荣誉表彰研究方法的综合优势

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必要对功勋荣誉表彰研究进行方法论层面的反思和佐证。应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力求在研究方法上有所突破,以便深入理解这一研究主题,提升研究可信度和理据支撑。

一是跨学科研究法。从交叉融合视角分析,突破单一学科论述局限,加强交流合作,汲取各学科所长,找准研究焦点,科学构建功勋荣誉表彰立体化分析模型,有针对性地对现实主题材料进行深究澄明。可以预见,将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文化学、传播学等相关学科领域的知识图谱加以整合,建构跨学科阐释体系,有助于提升论证的严谨性和专业性,增强功勋荣誉表彰研究的学科厚度和宽度。二是比较研究法。功勋荣誉表彰历史悠久,应坚持历史和逻辑的内在统一,持续盘点比较古今中外功勋荣誉表彰的建设思路,明晰不同点,寻求契合点,辨析功勋荣誉表彰的作用机制,并做好制度实践与经验模式层面的归纳总结。通过横向与纵向、宏观与微观等方法类型的多维比较研究,能够更清晰地揭示功勋荣誉表彰的本质特征和运行逻辑,为我们理解国家权力表达的荣誉价值面向创造条件。三是案例分析法。借助典型案例展开具体探讨,为主题研究

提供第一手资料,对于丰富功勋荣誉表彰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主要以中国特色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确立为时间节点,对其颁授实践与媒介报道进行深入考究。其中,在遵循现有的情景化和语境化立场上,进一步剖析荣誉治理的实践框架,探寻其中蕴含的内在价值规律和功能表达,尝试揭开荣誉运作的真实样貌,进而强化对功勋荣誉表彰实践动态演变的学理性研究。四是实证研究法。在方法论上,已有研究大多停留于定性层面的荣誉文本分析,较少运用实证方法去揭示荣誉价值的建构与表达过程,以及主体认知、情感、意志与行为的变化关系,在后续研究中需要进一步探索。所以,运用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测量社会认知和情感效应,并创新性引入AI大语言模型对功勋模范人物事迹文本与视频素材进行内容分析,挖掘其传播规律与价值引导模式,有助于弥补思辨性研究的不足,提升结论的统合性和精准度,亦能为其制度效能评估提供经验依据。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 [2]林尚立. 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0.
- [3]张树华, 潘晨光, 等. 中外功勋荣誉制度[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 [4]江国华. 中国国家荣誉制度立法的历史考察(1881-1949)[J]. 政法论丛, 2014(2): 22-30.
- [5]张年.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功勋荣誉表彰制度研究[D]. 锦州: 渤海大学, 2021.
- [6]李华. 中国共产党荣誉表彰工作的发展历程及基本经验[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52(4): 5-15, 195.
- [7]孙云. 中共英模表彰制度的肇始及演变[J]. 党的文献, 2012(3): 71-76, 82.
- [8]钱穆.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4.
- [9]张树华, 潘晨光, 祝伟伟. 关于中国建立国家功勋荣誉制度的思考[J]. 政治学研究, 2010(3): 39-43.
- [10]钱宁峰. 论国家荣誉制度的宪法基础[J].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2008(5): 14-22.
- [11]韩志明, 史瑞杰. 国家荣誉的社会认知——基于问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 中国行政管理, 2015(10): 64-68.
- [12]韩志明, 李欣. 国家荣誉实践的结构、过程及其问题[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4): 128-134.
- [13]姚东旻. 荣誉、地位的最优分配: 组织中的非物质激励[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 [14]王文臻, 祝伟伟. 俄罗斯的国家荣誉制度[J]. 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 2010(4): 40-50.
- [15]王文娥. 美国的国家荣誉制度概述[J]. 国外社会科学, 2010(1): 58-64.
- [16]朴光海. 韩国功勋荣誉制度研究[J]. 国外社会科学, 2010(1): 82-86.
- [17]何培忠. 与国家发展策略紧密相连的日本功勋制度[J]. 国外社会科学, 2010(1): 74-81.
- [18]唐磊. 澳大利亚功勋荣誉制度简介[J]. 国外社会科学, 2010(1): 65-73.
- [19]张树华, 贺慧玲. 国外功勋荣誉制度对我国的借鉴意义[J]. 人民论坛, 2012(36): 6-7, 256.
- [20]杨莉. 意大利国家荣誉制度概述[J]. 国外社会科学, 2017(6): 91-98.
- [21]王文娥. 美国的军事荣誉表彰制度: 历史与现状[J]. 国外社会科学, 2017(6): 83-90.
- [22]罗明煜. 美、英、新加坡国家教师荣誉制度的共性研究[J]. 教师教育研究, 2014, 26(5): 107-112.
- [23]司戈. 美国的消防荣誉表彰制度[J]. 中国消防, 2016(20): 55-56.
- [24]吴江. 国家荣誉制度建设研究[M]. 北京: 党建读物出版社, 2017.
- [25]陈高朋. 体育荣誉观及其实现机制研究[D]. 上海: 上海体育学院, 2022.
-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27]左高山. 论国家功勋奖励制度的内涵与结构[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7(7): 14-17.
- [28]莎伦·R. 克劳斯. 自由主义与荣誉[M]. 林垚,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5.
- [29]杨建顺. 论国家荣誉制度的建立[J]. 人民论坛, 2012(36): 16-17.
- [30]韩喜平, 巩瑞波. 边界与效度: 政党内部激励活动的原则论析——以中国共产党党内表彰活动为例[J].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2017, 21(4): 113-119.
- [31]张树旺. 用荣誉凝聚人民矢志复兴的精神力量[J]. 红旗文稿, 2020(17): 38-39.
- [32]国晓光. 国家荣誉制度设立与国家认同建构[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20(2): 89-94.

- [33]李涛.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国家荣誉制度的法治逻辑与价值意蕴[J]. 学习与探索, 2024(4): 123-132.
- [34]韩志明, 韩阳. 治理技术的社会建构——以国家荣誉实践为例[J]. 天津社会科学, 2016(4): 83-88.
- [35]张明师. 胶合与同构: 劳模形象变迁与国家意识形态[J]. 学术论坛, 2012, 35(2): 36-40.
- [36]周晔. 中国道路中的“表彰政治”——基于对“评比表彰”及地方政府行为的考察[D]. 南京: 南京大学, 2016.
- [37]石书臣. 发挥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思考[J]. 思想理论教育, 2022(10): 60-66.
- [38]托克维尔. 论美国的民主[M]. 董果良,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8.
- [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40]王变. 新时代国家功勋荣誉表彰的德育功能研究[D]. 广州: 暨南大学, 2022.
- [41]王海洲. 国家能力建设的象征维度[J]. 政治学研究, 2021(3): 127-140, 164.
- [42]薛洁. 国家荣誉体系: 尊崇人民力量的政治象征系统[J]. 学海, 2023(5): 33-41.
- [43]苗大鹏, 刘社欣. 新时代功勋荣誉颁授仪式的运行机理与功能表达——基于英雄文化培育的视角[J].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 2023(1): 70-78.
- [44]赵子恒. 荣誉表彰活动的仪式传播研究: 以新时代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为中心[D]. 太原: 山西大学, 2024.
- [45]陈莉莉, 柳建辉. 延安时期劳模荣誉表彰仪式的历史考察[J].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24, 28(2): 59-66.
- [46]张郑武文. 中国国家功勋荣誉表彰仪式传播研究[D].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47]李涛. 新时代国家荣誉制度的法治阐释: 意涵、功能与创新发展[J]. 社会科学战线, 2024(9): 231-239.
- [48]W. 理查德·斯科特. 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利益偏好与身份认同[M]. 姚伟, 王黎芳,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
- [49]杨清望, 刘世杰. 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我国荣誉法律体系的完善[J]. 学术交流, 2019(8): 64-73.
- [50]刘勇.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国家荣誉制度建设: 内在逻辑、问题聚焦与对策思考[J].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37(3): 71-78.
- [51]曾骊, 曾燕波. 国家荣誉制度之于当代青年价值培育的体系建构[J]. 中州学刊, 2023(10): 83-91.
- [52]姚晓娜. 国家荣誉制度与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J]. 思想理论教育, 2020(11): 51-55.
- [53]张晓交. 国家荣誉制度的爱国主义教育功能研究[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22.
- [54]蔡中华. 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推进爱国主义教育: 价值意蕴、内容指向与实践理路[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24(3): 123-129.
- [55]艾楚君. 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的精神引领价值[J]. 人民论坛, 2022(24): 67-69.
- [56]陈梦. 国家功勋荣誉教育融入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四重维度[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2(24): 51-53.
- [57]任鹏, 吕宏伟. 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建设的历史经验与现实启示[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24(9): 123-132.
- [58]周方, 王宗礼. 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的时代价值与教育功能优化研究[J]. 思想教育研究, 2023(4): 125-130.
- [59]杜明鸣, 袁娟. 我国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及其完善思考[J]. 中国人事科学, 2020(8): 4-12.
- [60]阮汨君. 国家荣誉制度的宪法整合逻辑[J]. 开放时代, 2022(4): 78-90, 7.
- [61]李涛. 国家荣誉制度构建的理论维度与法律路径[J]. 广东社会科学, 2024(6): 265-274.
- [62]李涛. 国家荣誉制度的创新发展: 理论构造与法治路径[J]. 社会科学研究, 2024(6): 134-141.

【责任编辑 史 敏】

The Governance Logic of National Honors: The Origin, Patterns and Prospects of Research on Party and State Meritorious Honors and Awards

YANG Yan

Abstract: The conferral of Party and state meritorious honors and awards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of promoting the national spirit and the spirit of the times, a crucial step in advanc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a powerful measure for uniting the strength for building a strong country and achieving national rejuvenation. Since 2007, domestic scholars have begun to conduct research on meritorious honors and awards. A review of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reveals that domestic scholars, drawing on diverse

disciplines, have engaged in rational academic reflections on the meritorious honors and awards system. Their work demonstrates a coherent logic and appropriateness, forming the following three basic research patterns. First, normative investigations at the institutional level, involving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practical reflec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nsideration of the meritorious honors and awards system. Second, an elucidation of its core at the value level, exploring the intrinsic characteristics and functional roles of meritorious honors and awards; Third, pathway optimization at the efficacy level, integrating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with practical exploration to analyze the strategie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enhancing meritorious honors and awards. However, overall, research on this topic remains in the accumulation stage, with relatively narrow perspectives mostly focused on describing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and arguing its necessity. There is a lack of systematic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and the examination of its internal operational mechanisms and practical efficacy is insufficient.

Keywords: national honors system; meritorious honors and awards; honor governance; symbolism; identification

(上接第99页)

Digitalization of Tax Collection and Administration and Urban Tax Effort: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Based on the “Golden Tax Phase III” Project

ZHANG Jiahao, LIU Chongxian & ZHANG Cheng

Abstract: The Golden Tax Project Phase III leverages information and digital technologies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tax administration and improve its standardization, precision, and transparency, thereby providing important support for adapting tax administra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modernizing tax governance, and ensuring stable fiscal revenues. Drawing on panel data from 253 prefecture-level cities over the period 2010–2023, this study treats the phased rollout of the project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and employs a staggere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ID) model to evaluate its impact on urban tax effort and to identify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The empirical results reveal that: (1) the pilot policy significantly improves urban tax effort, a finding that remains robust across a series of sensitivity tests; (2) heterogeneity analyses indicate that the positive effect is more pronounced in cities with higher urbanization rates, greater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and more advanced informatization levels; (3) the policy operates through two main channels—intensifying government fiscal pressure and promoting financial development—which in turn raise tax effort; and (4) further analysis suggests that the tax-effort effect induced by the policy also leads to increased spending on people’s livelihood and may intensify cross-regional profit shifting. Collectively, these findings offer empirical evidence and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for the ongoing digitalization of tax administration, underscoring both its favorable outcomes and the importance of mitigating potential adverse effects.

Keywords: Golden Tax Phase III; digitalization of tax administration; tax effort; residents’ welfare; regional profit shifting;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